

专家论坛

在变革中赓续传统 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前瞻

□ 李友梅

以19世纪末社会学传入中国为起点,中国社会学迄今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一百年前,老一辈社会学家就将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为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的核心命题。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进程,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命题被再度推到历史前沿,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关联日益紧密。在经历百余年发展、四十年的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如何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国社会学既需在变革中赓续传统,又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推动理论创新不断达到新高度,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境界。

1 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成功探索

社会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学的一贯追求,中国社会学百年前就已确立“立足本土、面向世界,认识国情、改造社会”的发展志向。

中国社会学的发源有着内源外引的双重性,其早期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多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潘光旦先生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学存在“过于空疏、不切实际”的弊病,引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在对接中国社会生活实际时“见同而不见异”。由于见不到人与人之异、此社会与彼社会之异、此历史与彼历史之异,数十年来社会学虽发达,所研究的问题虽多,却忽略了中国社会本身。因此,学者迫切需要建立起能准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实际的社会学。

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先生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40年代吴文藻先生提出社会学“彻底中国化”的主张,指出“中国目前问题的核心,是中西文化自接触以来所引起的根本冲突与整个中国社会组织的解体”,因此呼吁学界同仁共同寻求建立有效的理论构

架,并将之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研究,进而培养出研究中国社会的独立人才。吴文藻先生与其学生构建的社区、文化、制度、功能等社会学“概念格局”及其所倡导的社区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起点。社区研究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方法工具,加强了社会传统与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结合,使研究者在清晰把握社会的构成和结构特征的同时,实现对西方式社会与文化传统二分研究的超越。

老一辈社会学家在20世纪初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显而易见,他们从深切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切入,志在学术报社会本身。因此,学者迫切需要建立起能准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实际的社会学。

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先生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40年代吴文藻先生提出社会学“彻底中国化”的主张,指出“中国目前问题的核心,是中西文化自接触以来所引起的根本冲突与整个中国社会组织的解体”,因此呼吁学界同仁共同寻求建立有效的理论构

项目成果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唐前河陇文学

□ 丁宏武

河陇地区虽然僻处西北边隅,自古华戎交会,堪称苦寒边塞,但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河陇文化,而且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河陇文士。河陇文学发轫于先秦,在东汉后期和西凉时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受河陇边塞“风声气俗”的影响,河陇文学自先秦以来即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刚劲勃健、慷慨任气,激荡着华戎交会的雄宏气势和力量。

嬴秦兴起与河陇文学的滥觞

从有古史传说可印证的大地湾文化说起,河陇地区的历史可上推到8000年前。夏、商、周三代,河陇地区主要生活着氏、羌等古老民族。西周后期开始崛起的秦人,其早期在陇右的发展历史已经被传世文献及考古发现共同证实。据《史记·秦本纪》等记载,嬴秦之祖非子虽以“息马”受封,但秦人真正崛起于秦仲时代。秦仲凭借西戎反叛、大略母族灭亡和宣王中兴的历史机遇,不仅代替大略之族承担了“抗西戎”“保西垂”的历史重任,而且实现了部族文化由畜牧为主向“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的成功转型,使嬴秦部族成为中原礼乐文明在陇右边陲的传播者和代言人。据文献记载,秦国从秦仲时代开始有了明确纪年,秦国的礼乐文明也自秦仲时代开始奠定,秦人的发祥地“秦亭秦谷”在陇山之西甘肃张家川、清水一带。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掘,证明早期秦文化“和中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文化内涵实属同一体系”,尤其是大量出土的青铜礼器鼎、簋、钟、铉及石磬、车马器等,充分说明古人所谓“礼乐

射御,西垂有声”并非虚誉。从周宣王晋封秦仲为大夫到秦文公归葬西垂,早期秦人留守、经营陇右一百余年,极大促进了陇右地域文化的发展,见于文字记载的早期河陇文学作品也在此期间产生并广泛流传。

史籍所载秦人早期的文学作品,主要留存于《诗经·秦风》。关于《秦风》产生的时代和地域,郑玄《诗谱》有明确说明:“秦者,陇西谷名,于《禹贡》近雍州鸟鼠之山……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据此,则《秦风》诸作产生的时间上限当在秦仲时代;其产生的地域包括春秋时代秦国拥有的陇右关中地区。班固《汉书·地理志》认为:《诗经》中的《邠诗》与《秦诗》虽然同属“秦地”之风,但二者产生的地域风土迥然有别。《邠诗》产生于周人曾经活动的邠地,“故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秦诗》产生于天水、陇西等迫近戎狄之地,所以作品“皆言车马田猎之事”。清人顾栋高结合秦人早期发展历程及《诗序》《诗谱》相关论断,认为《秦风》中前五首诗都是秦人居于陇右时的作品:“自《车邻》《美秦》、《骝驹》《小戎》《蒹葭》《终南》,皆襄公时诗,此时居秦州。”

《诗经·秦风》中的部分作品应是秦人受命“保西垂”时期所作,与河陇地域文化密切相关。这些作品和出土的秦庄公时期的《不其簋铭》等早期秦文化遗存,都是河陇地域文化孕育的硕果,堪称河陇文学的发轫之作。这些作品的出现,与周宣王命秦仲作大夫,秦人“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密切相关,是西周后期中原礼乐文化和陇右地域文化交融影响的历史产物。

2 辨识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之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摆脱了“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社会有了切实的组织上的意义;改革开放加速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20世纪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改革社会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以“社会”为主题的领域,成为中国社会学界进行实践总结与理论思考的重点。

中国在巨变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总结与理论研究,不仅对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构

3 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境界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如此巨变中,中国社会生活如何得以再组织,社会秩序如何得以再协调?实践和时代对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学肩负着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历史使命,社会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不仅要熟知本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观,而且要具备深刻分析中国与世界动态联系的能力,如此方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科学性。因此,中国社会学正为构建既能阐明中国社会实践又能进行世界性学术交流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积极努力。

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转向了“需要”与“发展”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内涵”不断扩展,而且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层次”不

断提升。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既需要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又需要良好的社会心态、相互理解包容等思想境界的配合。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呼唤着社会学的力量,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变迁实践将为社会学理论和认识不断提出新课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新机遇。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在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背景下,具有方向性和目标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也是与世界格局变动密切相关,国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下多线程互动的复杂进程。真正辨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践历程,揭示充满复杂内涵的社会转型

独特性,需要建立一套可以真正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方法工具。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的境界,需要我们不断对现有认知模式和知识范型进行反思。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再是世界变化的被动“追赶者”和“适应者”,而是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影响者”。世界密切关注着中国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将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探索繁荣与发展之路。大变革时代呼唤着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学者正在这风云际会中赓续创新,探索着兼具学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我们应在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实践并将其提炼为学术语言等方面继续努力。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大学教授)

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让中国与世界“相通共进”的重要支撑。中国社会学在构建能够阐释中国社会整合的实践经验 and 符合中国社会运转特征的理论方法上,从认知、分析到理论对话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学术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来,仍存在比较严重依赖西方话语的学术倾向,在对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中提出的复杂现象,这也导致社会学本土话语体系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学术理论的原创

力不强。当前社会学中国化建设存在的内在困境与张力,不仅需要我们回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进程中去体会,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学存在的认知偏差问题;需要我们摆脱西方话语禁锢,超越西方化与非西方化的二元争论;我们需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共通性”,找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并在多元变化中把握“变与不变”的逻辑关联,创新兼具学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

独特性,需要建立一套可以真正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方法工具。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的境界,需要我们不断对现有认知模式和知识范型进行反思。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再是世界变化的被动“追赶者”和“适应者”,而是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影响者”。世界密切关注着中国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将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探索繁荣与发展之路。大变革时代呼唤着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学者正在这风云际会中赓续创新,探索着兼具学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我们应在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实践并将其提炼为学术语言等方面继续努力。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大学教授)

研究心得

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讨论荷马史诗开始,世界学术界对史诗的讨论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例如西方的“荷马诸问题”“莪相史诗问题”“伦洛特史诗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问题”“汉语史诗问题”等。其中,“汉语史诗问题”是中国学术界一直努力却仍未解决的难题。

汉语史诗具有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是长篇幅巨制、有神话故事、有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随着考古发现所提供的实物资料越来越丰富,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了从总体上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宏伟工程,并得出中华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等结论。这是汉语史诗形成发展的具体背景。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代表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术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思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建构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整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民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但其作品所承载和呈现的人文内涵,仍然是先秦以来河陇文化的“秦风”特质和文化品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河陇地区胡汉著姓与本土文学综合研究”负责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光明日报社理论部 主办

建构

□ 江林昌